



〔德〕威廉·冯·洪堡特著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 差异及其对 人类精神发展的 影响

—— 商 务 印 书 馆 ——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 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德〕威廉·冯·洪堡特 著

姚小平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 年·北京

07210
Wilhelm Von Humboldt

UE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Aus dem 7. Band der *Gesammelten Schriften*

Wilhelm von Humboldts in 17 Bänden

Herausgegeben von Albert Leitzmann, Bruno Gebhardt
und Wilhelm Richter

Berlin: Behr, 1903—1936

根据柏林倍尔出版社1903—1936年版的十七卷

《威廉·冯·洪堡特文集》的第七卷本译出

LÜN RÉNLEI YŪYÁN JIÉGÒU DE CHÄYÌ JÍ QÍ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
DUÌ RÉNLEI JĪNGSHÉN FĀZHĀN DE YĪNGXIǎNG
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德〕威廉·冯·洪堡特 著

姚小平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723-8/H·510

1997年5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820千

印数 8500册

印张 15

定价: 19.80元

译 序

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这个名字属于好几个领域。在德国近代史学者的笔下,他是一个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民主政治家,能干老练的外交家,学者型的社会活动家。他又是一个追求完美人性的教育改革家,科研与教学相统一的新型大学的创建人,因此常为西方教育史家提到。他有时出现在西方美学史、文艺理论的著作中,被描绘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和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思想的继承者,德国古典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类学家也经常提到他,因为他继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康德(Immanuel Kant)之后,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从事过“人的研究”,比较过民族、文化的异同。最后,在语言学史著者的眼中,他是一个伟大的语言理论家,普通语言学的奠基者。读者在这里看到的,便是语言学家洪堡特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我们的这篇译序,要向读者讲述这样几件事:第一,洪堡特的一生;第二,洪堡特早期的主要学术兴趣;第三,洪堡特有关语言的研究和著述;第四,洪堡特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最后,要交代一下洪堡特此书的版本。

一 生平

童年和学生时代

16 世纪 70 年代, 一个叫汉斯·洪坡特(Hans Humpolt)的手工业者在柏林从事皮毛加工, 并在那里获得了公民权。他就是洪堡特家族的先祖。到了洪堡特的曾祖父一辈, 家境已相当富庶, 购置了庄园田产。祖父约翰·保罗·洪堡特(Johann Paul Humboldt, 1684—1740)曾在普鲁士军事国家的创建者腓特列·威廉一世在位时任公职, 辞世前两年, 他被敕封为世袭男爵。于是, 在他的子孙的姓前面便添上了“冯”(von)这一贵族身份的标志。

威廉·冯·洪堡特 1767 年 6 月 22 日生于波茨坦(Potsdam)。弟弟亚历山大比他小两岁。父亲亚历山大·乔治·冯·洪堡特(Alexander Georg von Humboldt, 1720—1779)曾在军中供职, 担任过高级副官、宫廷侍卫官。母亲玛利亚·依丽莎白出生于一个富有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的家庭, 继承了家族的大宗遗产。她自幼深受启蒙运动思想的熏陶, 日后也把进步的思想灌输给了两个儿子。这是一个拥有种种社会特权和富足财力, 但又未受落后的普鲁士容克意识蚀染的新贵族家庭。母亲一心想要把两个儿子培养成为有益于国家的人材, 她为威廉请的第一位家庭教师是堪普(Joachim Heinrich Campe)。堪普信奉卢梭的教育思想, 以提倡“博爱”出名, 是新一代的优秀教育家之一。

13 岁时, 威廉已经会讲法语, 也学会了读拉丁语和希腊语。他偏爱文学、历史、语言, 喜欢读法国启蒙作家以及柏林启蒙运动代

表人物的作品。弟弟亚历山大则对自然科学，尤其是植物学更感兴趣。

1783年，洪堡特兄弟迁往当时的普鲁士首都柏林(Berlin)。在那里，他们仍不入公学，继续受业于家庭教师，同时也常常去听私人教师为别家贵族子弟讲的课。从1783年到1787年进入大学前的一段时间里，洪堡特兄弟经常出入柏林市民阶级的沙龙，问学于社会知名人士，如颇有名望的哲学家恩格尔(Johann Jacob Engel)等人，他们大都是启蒙运动的拥护者，代表了市民阶级和知识界的进步力量。

1787年10月，洪堡特兄弟来到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Frankfurt an der Oder)，在家庭教师孔特(G. Kunth)的监护下开始大学生活。按照母亲的要求，威廉以法学为主课，兼听经济学、教会史、国家史等课。亚历山大则主修财政学(时亦称国家经济学)。威廉对陈旧的教学方法感到不满，宁愿花更多的时间闷头读书。半年后他移学哥廷根大学，先后修习法学、哲学、历史等科。哥廷根(Göttingen)期间，洪堡特第一次接触到康德的哲学思想。他认真研读了康德的新作《实践理性批判》(1788)。对于年青的洪堡特，康德是最有吸引力的哲学家。四十余年后，在洪堡特的心目中，康德依然位居哲学伟人之首。在“关于席勒及其思想发展过程”(1830)一文中，洪堡特对康德哲学有这样一段评论：康德具有伟大思想家所应有的一切特点，他的著作是哲学理性在一个人身上可能达到的最伟大的成就；康德考察了以往所有时代、一切民族的哲学思想，对各种哲学分析方法作了检验和筛选，铲除了前人加于哲学之上的种种虚幻的建筑，他又将一种深刻的辩证法贯彻到自己的哲

学体系之中,从而为真正的哲学发展铺平了道路,所以,“在最真实的意义上说,是康德把哲学重新带回到了人类的怀抱”。^①

1788年8月,洪堡特偶遇卡罗琳·冯·达赫奥登(Karoline von Dacheröden),两人很快成为知己,彼此爱慕,三年后,他们举行了婚礼。卡罗琳的父亲达赫奥登伯爵(Karl Friedrich von Dacheröden)曾任普鲁士议院主席。在1736—1815年的《埃尔夫特编年史》里,记载着一段颂扬这位贵族的文字,称他是当地“科学的保卫者”,“许多学者和艺术家的恩主”。

洪堡特和卡罗琳的婚姻是幸福美满的。两人的出身、地位相当,信仰、志向也一致。卡罗琳还给洪堡特带来了大宗财产,使他成了一个富翁。卡罗琳是一个善持家事的母亲,在各方面都是洪堡特最可信赖的帮手。在从事政治活动方面,卡罗琳对洪堡特的帮助尤其值得称道。没有她的催促推动,洪堡特在1809年就不会如此积极地投身于普鲁士国家的改革运动。她身上充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813年,当洪堡特正为是否接受驻维也纳宫廷使臣一职犹豫不决时,卡罗琳在信中告诫道:“在这样严峻冷酷的时代,我想你更有不可回避的义务为普鲁士尽职到至少五十岁为止。”^②

卡罗琳和她的父亲一样尊崇爱护科学艺术。在洪堡特出使国外的那些年里,特别是在罗马(Rom)期间,洪堡特夫妇经常与许多艺术家和科学家聚会,出款资助他们的事业。这首先要归功于卡罗琳的努力。在洪堡特传记家的笔下,卡罗琳是浪漫主义和市民解放时期最优秀的妇女之一。

1789年7月中旬,怀着认识世界的热望,洪堡特与堪普结伴

踏上去往巴黎(Paris)的路程。半路上,他们获悉巴士底狱已被攻陷。8月3日,洪堡特一行抵达巴黎。在20余天的时间里,洪堡特作为旁观者目睹了巴黎革命第一阶段的进展:废除封建特权,取消教会什一税。他看到了国民议会举行会议的热烈场景。他来到巴士底狱的废墟之上,里里外外细细地观看了这座象征着封建专制的古堡。8月27日,洪堡特一行离开巴黎的那一天,制宪会议通过了《人权宣言》。

第一次巴黎行的所见所闻,给洪堡特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也为他不久后撰写政治文章提供了感性素材。

1790年初,洪堡特在柏林向普鲁士国王呈交了一份谋求司法部职位的申请。当时,象洪堡特那样出身贵族的青年,大学毕业后往往要任一段时间的公职,然后决定未来事业的方向。洪堡特的母亲和卡罗琳的父亲都希望洪堡特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他本人对政治也很感兴趣,他把从政看作实现为人类服务这一伟大目标的好机会。

在参加了必要的资格考试后,他于同年4月被任命为市法院的初级法官(Auskultator),不久,他又通过了一次考试,成为宫廷和议会法庭的后补官员(Referendar)。同时,他也在外交部寻职,同年6月,获得担任公使馆参赞(Legationsrat)的资格。但是,出乎亲友们的预料,他并没有马上接受公职。他认为,他已具备的知识和经验还不足以使他担负起为公众服务的重任,一个人必须首先充实和完善自身,而后才谈得上在社会上施展抱负。于是,他计划用几年的时间来实施“自我教育”。

自我教育：早期学术探索

1791年至1794年前后，是洪堡特矢志实行“自我教育”计划的时期，也是他开始学术探索的时期。

从巴黎归来后，洪堡特一直关心着法国革命的进展。1791年，路易十六签署了基于《人权宣言》的法国新宪法，这部宪法把专制主义的法国转变成了君主立宪国。但是，人民的大多数仍然没有参政的权利，这又违背了《人权宣言》的基本精神。同一年，洪堡特写了第一篇政治论文，题为“关于国家宪法的思考：法兰西新宪法的启迪”。他在文章中评价了新宪法的得失，讨论了国家机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由于新闻检查的缘故，这篇文章只能在一些朋友手中传阅，直到1851年才得以正式发表。1792年，洪堡特写下了《关于如何确定国家之权限的尝试》一作。这部政治著作的部分章节当年发表在几家杂志上，而完整地面世也迟至1851年。1793年，洪堡特又写了“人类教育理论”一文。

这些文章所包含的思想，决定了洪堡特以后的政治活动和教育改革的方向。

这个时期，洪堡特将很大一部分时间用在欧洲古典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的研究上。在以后的岁月里，古典文化对洪堡特来说始终既是专门研究的对象，又是工作之余的嗜好。

年青的洪堡特学术兴趣十分广泛。他试图通过人文科学范围内的全面探索来达到自我教育的目标，所以，政治、法律、哲学、历史、人类学、美学、文学、艺术、语言等等无不是他想下功夫细究一番的科目。然而这样一来，他的研究面铺展得过广，妨碍了他集中精力钻研某个方面的问题。往往，他还没有写完一个题目，就又开

始着手搜集另一个新题目所需的材料，或者刚刚拟下一项研究的草纲，却又转而去筹划另一项研究。他早期的研究总的说来是杂而不精，泛而不深的。

与席勒、歌德的友谊

在认识洪堡特之前，卡罗琳与席勒的妻子就是亲密的朋友。1789年圣诞期间，洪堡特与席勒在魏玛(Weimar)初次会面，此后，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794年2月，洪堡特夫妇迁居耶拿(Jena)，他们与席勒一家事先商定一同在这个城市居住。两家居舍相距不远，洪堡特和席勒通常每天都要互访几次。他们经常一起接待来访的朋友，其中有歌德、科尔纳(C.G.Körner)。有时他们也一起去听当时还不大有名气的哲学家费希特(J.G.Fichte)讲课。席勒与洪堡特对“自我教育”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主张人性至上，主张自我发展完美和谐的人性；他们两人都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了有助于自身修养和发展的东西。他们赞成法国革命的宗旨，但都对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感到失望。

席勒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洪堡特。洪堡特把席勒视为知己，也把席勒看作从事学术研究的榜样。他曾将席勒与康德、歌德作过一个比较：康德是哲学天才，歌德是诗歌天才，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作出了前人未可企及的贡献，他们属于哪种类型的伟人，世人已有公论；席勒则不同，他有哲学和诗歌两方面的天赋，并且试图把这两个方面融为一体。^③在洪堡特看来，席勒是完善和谐的人类知识的代表，因为，诗歌和哲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两大领域，而席勒在这两大领域里都有辉煌的建树。在耶拿的岁月是洪堡特思想

发展成型的最重要的时期，而在精神上对他裨益最大的人就是席勒。1805年席勒去世后不久，洪堡特在致友人科尔纳的一封信里充满悲惋之情地写道，席勒的死使他感到像是突然失去了一颗为他指出知识方向的明星，因为在认识席勒之后，他写每一篇文章都是以席勒的思想为唯一的判断准则。^④

对洪堡特来说，席勒又是一位难得的诤友。年青的洪堡特兴趣广泛，求知心切，富有献身人类进步的热情，但是，他想做的事太多，对自己的能力缺乏全面的衡量。他喜爱文学，崇敬伟大的诗人作家，于是也渴望在文坛上有所作为。然而，他并没有诗人作家的才气，也远远谈不上是一个语言大师。洪堡特在寂寞的晚年写了许多首商籁诗，从艺术角度看只能说是平庸之作。席勒曾直率地向洪堡特进言：虽然洪堡特在其它方面不乏天分，但不具备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天才；在文学艺术方面，他的批评赏鉴的能力高于自由创作的能力。十几天后，洪堡特回信表示，席勒的意见十分中肯，他很乐意接受。在次年9月4日写给席勒的信中，洪堡特向席勒诉说了心中的苦恼。他感到自己在精神发展上陷入了想象力不足和思辨能力不强的双重困境，“现在我深信，除了听从您的告诫外我别无它择：我将使我的想象力变得更加生动，使我的思想变得更加深刻”。^⑤

另一方面，对席勒来说，洪堡特是一位能够提供真知灼见的挚友，一个能够推动他的艺术事业向前发展的崇拜者。席勒在一封信里告诉科尔纳：“认识洪堡特是件令人十分愉快，十分有益的事。与他谈话时，我的所有思想活动都得到了更成功，更迅捷的展开。”^⑥洪堡特虽非诗人作家，但他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文评家。每当席勒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都要与洪堡特交换看法，他拟定每一个创作

计划,都要与洪堡特进行讨论,他的每篇文稿(例如他写于1795年前后的名作《美育书简》)在付印前都要征求洪堡特的批评意见。

1795年7月初,洪堡特赶回特格尔(Tegel)探望病情加重的母亲。次年11月初,他又回到了耶拿。在这期间,他平均每天都要发出一封给席勒的信。在柏林,他还致力于出版席勒的《1796年诗歌年刊》(Musenalmanach für 1796)。席勒逝世后25年,即1830年,洪堡特把他与席勒的部分往来书信汇编成集,加写了序言“关于席勒及其思想发展过程”后出版。

洪堡特与歌德的交往,不像他与席勒的交往那样频繁密切,这跟歌德与洪堡特的年龄相差更大有一定关系。他比歌德小18岁。洪堡特来到耶拿定居的那一年,适逢歌德与席勒定交,开始携手合作,共创德国文学史上的“古典时期”。耶拿和魏玛成了德国文学界精神生活的中心。洪堡特常有机会听到席勒与歌德的谈话,参加他们的讨论。他是这两位该时代德国最伟大的文豪建立起亲密协作关系的见证人。

洪堡特1796年11月初回到耶拿后,与歌德的联系较以前更多了。他经常去邻近的魏玛城拜访歌德,歌德也十分乐意听取他的批评见解。他在1797年4月7日给卡罗琳的信中表达了访问歌德后的愉快心情:“歌德十分热情友好。离他那么近,和他单独在一起,真是太好了。……歌德一再讲起与席勒的共同生活给他带来的乐趣和收益,他说,除了席勒,在美学原理上还从来没有过一个人和他的看法如此一致。”^⑦常有评论家说,席勒和歌德除了彼此的友谊外,只有为数不多的好友,而洪堡特便是他们两人最好的朋友之一。^⑧1794至1797年期间,在席勒和歌德的小小的活动圈

子里，洪堡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在1797年3月28日给朋友入的信中，歌德谈到当时他周围最亲近的一些朋友的活动时说：“席勒正勤于撰写《华伦斯坦》，威廉·洪堡特正在翻译埃齐罗斯(Aischylos)的《阿加梅农》，而大施勒格尔(A. W. Schlegel)则在翻译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裘力斯·凯撒》。”^⑩歌德后来把他与席勒的通信编成集子，从这些书信里可以看出，歌德、席勒当时与洪堡特之间有着一种多么友好的关系。经常来耶拿探访兄长的亚历山大·洪堡特与歌德也建立起了友谊。亚历山大当时担任普鲁士王国负责采矿业的高级官员，他那丰富的物理学、地理学、化学知识使得向来爱好自然科学的歌德眼界大开。而亚历山大对歌德仰慕已久，他在后来(1825年)的一封信中对歌德说：“两个洪堡特都属于您，他们一生中引为骄傲的事，便是赢得了您的赞赏。”^⑪

在洪堡特的心目中，席勒和歌德是德国文学特别是诗歌领域中的两位空前绝后的人物。在1804年2月4日致布林克曼(C. G. von Brinkmann)的信中，洪堡特担忧地写道，在席勒、歌德之后，德国诗歌将面临危机，因为“既不可能出现第二个歌德也不可能出现第二个席勒”。他认为，德国诗歌缺少一种“感性的生动气氛”，他寄希望于施勒格尔兄弟(A. W. Schlegel和F. Schlegel)，他们也许会努力将这样的生动性赋予德国诗歌，“要是他们成功了，就赢得了一切，而如果失败了，那么，当代的英雄也就成了最后的英雄。”^⑫席勒去世后，洪堡特在1808年12月28日自魏玛写给妻子卡罗琳的一封信里说：“他(指席勒)是我迄今为止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倘若歌德也逝去了，德国(文坛)就会沦为一片可怕的荒野。感谢上帝，歌德还健在。”^⑬

与席勒、歌德的交往，使洪堡特对美学问题有了更大的兴趣。他打算作一系列美学探索，写一部《美学尝试》，但这个题目就像他的许多其它计划一样，他也只完成了一部分。1798年洪堡特在巴黎时写成了“论歌德的《赫尔曼和窦绿苔》”，一年后在布伦瑞克(Braunschweig)出版。在这篇文评中，洪堡特称赞歌德创造的人物形象一方面十分真实，富有个性，源自自然生动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则极其纯粹和理想化，仿佛永远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他不满足于分析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而是企图建立一种艺术理论。洪堡特曾与歌德、席勒等人就文稿进行过讨论。歌德表示欢迎，称它是一篇“感人的佳作”。席勒则有不同看法，他在1798年6月27日给洪堡特的信中直率地批评说，象洪堡特那样采取一种思辨的途径来分析一部具体的诗作，是一个失误。席勒承认，这种失误是由于他本人对洪堡特美学思想的影响而造成的：他和洪堡特都力图将一种艺术的形而上学直接运用到具体的对象上，把这种形而上学当作了实践的工具，而实际上它并不那么灵活适用。不过，这时的洪堡特对自己的探索却显得很有信心，他在同年7月12日的信中告诉席勒：“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深信，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知识专业适合我来从事，那么这一专业就是批判(die Kritik)，如果说我可以要求获得美德，那么这种美德就是公正(die Gerechtigkeit)。”^③

耶拿时期，洪堡特从他 与席勒、歌德的交往中得到的教益，要比他能够给予席勒、歌德的帮助多得多。这并不奇怪。他的思想还不成熟，“自我教育”尚未完成，况且，他的学术才华后来证明并不是在文学艺术方面，而主要是在语言学方面。所以，有人把当时

洪堡特在席勒、歌德联盟中的地位比作一颗环绕着两个太阳运转的卫星，它轨迹不明，只发光而不生热。^④然而，正是洪堡特的这一有利的“卫星”地位，使得他有可能作为文艺批评家继续伴随席勒和歌德的创作活动，确立起一些批评的标准，丰富了康德以后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更重要的是，由于洪堡特日后的努力，古典主义文艺思想扩大到了整个德国的文化教育领域，他因此而被称为堪与席勒、歌德并重的德国市民阶级古典文化的伟大代表。

第二次巴黎行和两次西班牙行

1797年4月下旬，洪堡特离开耶拿。母亲于1796年11月中去世后，给洪堡特兄弟留下了可观的遗产。威廉分到了柏林的一处房产和特格尔的庄园。他是一个爱惜家产并且也善于理财的人。弟弟亚历山大则分到9万塔勒^⑤，他决定用这笔钱环游世界，他后来的美洲之行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自费科学考察。

1797年8月初，洪堡特兄弟从德累斯顿(Dresden)出发，计划经布拉格(Prag)、维也纳(Wien)前往意大利。威廉·洪堡特一家加上弟弟亚历山大，一行共13人，被歌德戏称为一个“旅行团”。由于拿破仑·波拿巴率领的法军与奥地利军队、意大利军队之间的战事，洪堡特一行没有能到达意大利。与亚历山大分手后，威廉·洪堡特一家于1797年秋天从维也纳出发，前往巴黎。

洪堡特欲去意大利，是为了追求他所憧憬的古典主义的理想，寻找欧洲古典文化的线索。他改行巴黎，则是为了再次观察探索社会现实。相隔八年之后，他又站在了巴士底狱的废墟上。他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法国社会事态的发展，随时随地把所见所闻记

于纸上。他从报刊上摘录下有用的材料,对政治事件、社会动态加以点评;他经常出入剧院、画廊、博物馆,赏析法兰西文化生活的诸方面;他还像以前那样注意观察和描绘周围的人。

在法国,洪堡特看到的是一个文化和政治上自成一体的民族,它的统治者正觊觎着整个欧洲大陆。另一方面,强盛的英国也在竭力扩张,企图建立起一个世界殖民帝国。然而德国呢?不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分裂的德国都十分落后。作为一个德意志人,洪堡特意识到,应该负起社会责任,尽己所能为本民族服务,而不应该只满足于自我修养。在巴黎,他是一个来自异国的侨民,一个以私人身份从事研究的学者,但他把宣传德国古典文学的思想看作自己的一大任务。当时,没有任何人像洪堡特那样满怀真挚的感情,那样如实可信地在法国报导席勒、歌德的生活和著述。他成了德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第一使者。

洪堡特夫妇在巴黎的住所,是旅居巴黎的德国上层人士及当地一些社会名流经常聚会的地方。在他们的客人中,有被称为“法国革命的画家”的杰克-路易·戴维(Jacques-Louis David),有后来成为拿破仑的宫廷画师的热拉尔(François Gérard),有狄德罗(D. Diderot)的女儿芳杜依(Angélique Vandeuil),还有被时人赠以“欧洲第一夫人”美称的作家斯达埃尔(Germaine de Staël)。洪堡特常去拜访斯达埃尔夫人,他们成了好朋友。在法国革命问题上,洪堡特与斯达埃尔的看法相近。洪堡特在日记里写道,斯达埃尔是一个热情的女友,完全可以信赖,尽管她作为母亲和妻子不怎么合格。洪堡特敏锐的思想和德国式的博学多识,给新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达埃尔夫人称他是“欧洲最有能力的人”(la

plus grande capacité de l'Europe)。洪堡特是正在崛起之中的德意志精神在国外的宣传者和德国文化的传播者，这是后来英国人阿克顿爵士(Sir Lord Acton)之所以称洪堡特为“德国最中心的人物”(the most central figure in Germany)的缘故^⑤。

1799年9月至1800年4月，1801年4月至6月，洪堡特先后两次从巴黎南下，游历了西班牙。旅行中，他不仅停留在一些大城市和文化中心，而且走访了许多小城镇和乡间田舍，了解到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人民的生活现状。他的旅途观感和考察结果记于《1799—1800年西班牙旅行日志》，这部日志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才为人们发现。洪堡特对西班牙的封建制度和教权主义持批判态度，对那里落后的教育状况尤感失望。

驻罗马使节

1801年8月初，洪堡特从巴黎回到柏林。那时的柏林文苑是浪漫主义流派的天下，洪堡特作为古典主义的信奉者，难以在浪漫主义者中间找到知音。他感到寂寞，怀念着耶拿的美好岁月。1802年5月，洪堡特被任命为普鲁士派驻罗马梵蒂冈教廷的使节。他很早就盼望有一天能亲眼看到古罗马文化的遗址，所以很愉快地接受了任命。9月初，洪堡特携全家离柏林赴任。南行途中，他在魏玛最后一次见到席勒。

在罗马，洪堡特很快显示出过人的外交才干。当时的普鲁士外交大臣豪格威茨(Haugwitz)对洪堡特的工作十分满意。其实，洪堡特的外交任务并不多，因为当时罗马教廷在欧洲事务中很少有发言权。